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成功经验、 实质内容及建构方略 ——以尼日利亚为例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 要] 中国和非洲国家同是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是进入了各自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给中非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带来新契机。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非洲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国和尼日利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成功经验、实质内容和建构方略对中非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尼日利亚发展前景既迎来良好机遇,又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只要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那么总体上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中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以产业链高端化、价值链现代化为主攻方向,积极对接中尼各自发展战略和重点合作领域,探索对现有合作存量的潜力挖掘和二次开发,不断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努力为尼日利亚破解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贡献智慧和力量,并将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推广扩散到更多非洲国家,将实现中国与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和政策规划继续深入对接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 战略崛起; 命运共同体; 新兴国家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583 (2024) 02-0005-11

[DOI] 10.19643/j.cnki.naer.2024.02.001

[收稿日期] 2024-01-05

[作者简介] 丁 工 (1982-), 男, 山东济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

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取得丰硕成果,2014年GDP高达5099亿美元,不仅跃升成为世界第26大经济体,还成功超越南非加冕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虽然尼日利亚经济发展迅速、前景良好,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仍然存在难以掌控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借助一些有



利因素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尼日利亚是我国的传统友好伙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主要合作国家之一。中尼两国自1971年建交以来关系发展顺利，在科学、教育、文化、就业、卫生、金融和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2005年两国元首就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2009年首次举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对话。特别是随着2018年9月两国领导人就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实现中尼合作的广度、深度、高度同步晋级填充新内容、注入新动能，为尼日利亚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贡献智慧和力量，更为尼日利亚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积极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在非洲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尼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成功经验、实质内容和建构方略对中非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给中非合作提供新平台、带来新契机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天然伙伴和战略依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自身定位和角色认同。^[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和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具体政策依据国际形势发展出现了一定变化，但中国身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属性没有变，对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事关全局”的战略定位和基本认知没有变，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交往、视发展中国家为对外关系依靠基石的政策方针和决策部署没有变。^[2]2018年6月，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重申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战略基础的说法，他强调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3]2018年7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不久，习近平主席开启当年首次出访，来到中东、非洲6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此举既是向世界发表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宣言，也是对中国外交将继续依托发展中国家基石作用的重申，更是就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生动注解和成功路演。事实上，近几年中国针对发展中国家频繁密集的外交活动，不仅是中国夯实巩固发展中国家外交基础的实践任务，而且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工作方向之一。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对于完善外交布局结构和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在我国发展中国家外交布局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在中非深入合作持续推进的同时，非洲问题也日益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欧非首脑会议、法国—非洲峰会、俄罗斯—非洲峰会、美非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印度—非洲峰会等国际合作平台相继涌现，加强在非洲的国际竞争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关切之一。^[4]不难看出，全球主要大国或国

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处于深度调整期，各方都在积极推进或调整对外战略以应对新的国际局势，非洲也开始成为各个主要战略力量争取的对象。一直以来，中国都高度重视非洲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始终将非洲国家看作是互惠互利的好伙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中非关系所蕴含的经历相似、理念相近、利益相融的特点，赋予了双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基础牢固和现实需要紧迫等诸多先天优势和良好条件。当前，非洲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重建加速期，正处于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的新阶段。因而，期待能够从中国发展成就中看到希望、得到启示、发现机遇，也更期待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和发起，以提高沿途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和永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实现中国与沿途及相关各国互补共进、协调发展、多方共赢为归宿的国际合作倡议。^[5]“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不仅是要寻找优化中国优势产能的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发展战略，还是中国通过差异竞争、错位发展、产能合作提升对象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探索、帮助合作共建国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增长效益的最佳渠道，特别是能够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产业链条完整、功能配套齐全的工业集群，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输血”到“造血”质变升级的实效举措。^[6]因而，该倡议一经推出便立刻赢得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尤其受到包括非洲在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非洲国家几乎普遍是以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处于较低的层次。中国与非洲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客观差距，决定了两国在开展产能错位合作、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拥有巨大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从而也决定“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最大程度发掘和带动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助推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的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双方在文化、科技、旅游、农业、经贸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多，不仅促进了彼此之间商品技术、文化思想的交流互鉴，也带来了实体器物 and 知识观念的创新发展，进而显著提升了中非合作的深度和协调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通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动新技术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加快融合，对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深化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显著增强非洲国家的自主和永续发展能力。中国和非洲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载体进行产业对接和深度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更有利于加快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扭转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因此，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有效促进中非双向投资持续扩大，深度整合双方在产能、融资、基建及市场等多方面的资源要素，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当地就业和民生保障问题，极大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就业和收入状况，提升其工业化的聚集度



和附加值，最终形成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布局，增强非洲国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帮助它们在立足自身国情基础上孵化和培育新业态的目标。

二、中国与尼日利亚合作的成功经验和实质内容对非洲的意义

尼日利亚是非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和发起国之一，是牵引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成立的发动机和驱动器，也是促进非洲民族解放和联合自强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7]在南非白人政权因采取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之前，尼日利亚还一直承担着非洲黑人谋求民族解放的“代言人”角色。^[8]随着尼日利亚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纷纷将尼日利亚列为非洲地区的外交优先和战略支点国。尼日利亚也趁势开展多层次、宽渠道、全方位的大国外交，并将当下国际秩序大分化、大改组之际视为谋求更高地位的机遇期，试图借助国际主要势力博弈加剧之机实现国家影响力的跃升。中国和尼日利亚均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两国都注重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主张以改革合作而不是革命方式来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挑战现有制度规范，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都始终努力以发展中大国身份倡导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目前，尼日利亚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和新兴石油供应国，是中国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重点挖掘的国家。^[9]而且，中国和尼日利亚均高度评价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的势头，互视对方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一致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双边关系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又给双方合作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和对接点。2018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和布哈里总统的共同见证下，中尼两国在北京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能与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振兴战略达到高度的契合，就在于两国理清和锁定了双方互有优势、互有需求、互为机遇的契合点，而这些特点对中非合作有很高的适配性和应用性：

一是由于各方势力的分化改组加快，发展中国家也呈现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有鉴于此，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在继续遵循整体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前提下，在具体做法上更加强调从创亮点、增特色、求突破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区域和国别外交工作，提升优化外交力量高效运用，促成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由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开始向根据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处置策略和优先等级的趋势转变。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从理念到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跨入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必然需要遵循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的思路，需要采取综合统筹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的策略，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既分层次、又讲重

点, 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以重点突破带动“一带一路”建设水平整体跃升。因此, 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非洲国家中, 首先应该选择与我国合作愿望强烈、基础条件较好、产业契合度高的国家作为重点对象, 尝试以这些条件比较成熟的“点”为样本进行摸底探路、优先建设, 随后打响品牌效应再向有广泛共识的“面”上大力推广, 通过“连点成线、聚线成面”做到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 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要素流动密切、资源配置高效的合作格局, 实现点、线、面三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目标。^[10] 尼日利亚是非洲和发展中大国, 具备边际产业转移需求的市场空间和发展腹地, 能够形成产业合作的区域集成效应, 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支点国家的作用, 从而建立起尼日利亚及其他非洲国家中心—辐射型合作模式。

二是尼日利亚经济结构既不齐备、也不健全, 农业基础薄弱、油气比重偏高, 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资源驱动属性, 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85%、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来源于能源行业。一方面, 充沛富足的油气矿产资源, 既为尼日利亚占据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第四把交椅铺平道路, 也为国民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尼日利亚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是西方国家重要的石油供应国, 西方国家则是尼日利亚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欧美背景的外资和跨国企业也是其能源勘探挖掘技术的来源方。但尼日利亚对国际石油市场和境外能源资本的高度依赖, 导致经济对外依赖性持续增长, 不仅造成本国石油产业运营成本高企, 还冲淡国际大公司向石油行业投资的意愿和热情。另外, 尼日利亚“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使得快速城市化进程,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有限, 并且还导致了污染严重、过度拥挤、交通拥堵和其他负外部性效应。^[11] 尼日利亚产业调整、人口转化与城市职能的发展极不匹配、不协调, 石油投资过热推动以服务业和房地产行业拉动的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 形成没有工业化支撑的“虚假”繁荣局面。^[12] 而当石油产业带动力下降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 尼日利亚的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能力又无法继续承担起支撑、推动城市化的重任, 就会成为引发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如果尼日利亚不能有效改变这种扭曲的工业化和畸形的城市化并存的发展模式, 不排除再次被南非重新迎头赶上的可能。因此, 中尼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为重点, 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 在发展中破解治理难题, 不仅能发挥我国制造业产能优势, 还有利于促进当地制造业发展, 能源基础设施更新扩建, 破解“大城市病”困局, 推动尼日利亚经济产业的链条式增长、集群化壮大、方阵型崛起加速形成。^[13]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成功, 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为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问题、探寻发展道路提供了“灵感源泉”。自1949年建国后, 中国走出一条立足自身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符合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自主创新道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高效发展、又希望自主自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形成自己的独有特色, 具有复制和推广的价值, 只不过是便于参



考效法、却不适于照单全收，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两个国家的现实条件不同。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认为各国终究得按照自身的国情摸索出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可以给已经进入国家发展新阶段的尼日利亚提供借鉴和参考经验。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传统农业过渡到劳动人力密集型工业，再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进化过程，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可取之处，对尼日利亚力争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跨越式发展具有较高借鉴价值。又如，尼日利亚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中国则成功实行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多个旨在统筹推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因此，中国可以把在国土综合开发和区域统筹发展中，如何从宏观战略高度形势概略的综合分析，到中端层面具体施政的精确设计，再到微观战术级别的沟通磋商和贯彻落实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和政策实践介绍给尼方，有助于尼日利亚提高资源要素的整体利用效益。

三、“一带一路”下中国和尼日利亚合作的道路选择与政策举措

中国和尼日利亚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双方通过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要国际多边机制框架内开展沟通与协调，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增进国际合作，以各国资源禀赋为基础开展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有助于共同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有益于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未来中国和尼日利亚进一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体而言可以优先考虑从以下角度来展开。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快沿途和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它的本质目标和主体内容就是要实现经贸流、金融流、智慧流、信息流、人文流等五个大流通，这五个大流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共生的五个子系统。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超级系统工程，将会面临不同国家经济、社会、法律、环保、劳工等制度和政策各异的情况，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评估和应变准备。尼日利亚所在西非地区历史和传统独特，相比欧美在非洲已经经营数百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均有非常深的根基，中国无疑是地区事务上的“新手”。^[14]中国和尼日利亚要确保长期有效的政策沟通和项目协调，完善对接合作的信息服务平台，遵循长计划、短安排、立即做的方式，以使“一带一路”为尼日利亚增强自主和永续发展提供“造血”功能。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是当下尼日利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短板和瓶颈，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放眼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拥有从前期规划设计、到中期施工建造再到后期运营管理的全套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能够为各种基建项目提供全流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随着中国工程承包企业逐渐向投资运营迈进，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运作转型，中国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积累的实践经

验，加上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运不足、需求旺盛，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认可和行动，为推动双方高品质、多层次基础设施合作局面的加速形成创造了条件。尼日利亚作为西非商业中心和物流枢纽，对周边国家有很强的经济辐射力和吸聚力。以尼日利亚为西非地区的商贸物流和综合交通枢纽，通过打造铁水联运、港城联动现代物流“综合体”，可形成覆盖公、铁、水、空等不同境域维度的互联互通格局。

三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将对商品生产、服务和人民收入产生广泛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商品贸易逐渐转向产能合作升级，中国在投资尼日利亚时注重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资本集聚，以贸易投资创造和催生能源合作新业态、新模式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局面，促进单一产品输出到“技术+管理+服务”整套经营系统出口的模式转变，而这又从反相实现贸易方式和产业结构双重优化的目的。贸易畅通的内涵不仅表现为贸易与投资的增加，而且深入到贸易投资的体制机制保障、贸易投资纠纷和风险的解决与防范等诸多方面。中国与尼日利亚还应该就直接投资的行业标准、技术导则和服务规范加强对接，降低进出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提高货物通关效率，进而助力尼日利亚经济发展体系形成内生型与外向型兼容互益的格局。

四是，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血液，资金融通决定着经济运行、跨国合作、对外交流的血脉和经络能否畅通。资金融通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在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方面承担着独特的支撑角色。从现实情况看，EPC+融资项目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项目管理的主流，非洲基建合作主要是通过向中国金融机构或多边金融组织贷款的方式完成。这种方式对非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时间内也迅速缓解了一些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滞后的困境，但由于非洲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不能与投资规模巨大、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导致融资瓶颈成为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之一。^[15]因此，中国与尼日利亚在推动资金融通合作时，可以尝试构建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多层次融资体系，鼓励我国企业积极探索PPP模式等新的合作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货币互换、本币结算等方式，促进资金融通、服务贸易和投资兴业的便利化。

五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密切交往，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了解和相互信任。^[16]因此，“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是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货币流通，而且也是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虽然中国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平台，又是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载体，但个别西方国家仍有质疑乃至歪曲中国动机的声音，部分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时有误解、偏见。这不利于国际社会营造友善的对华政策，也影响西方和其他国家公众对华认知的客观性和精准度。中尼可以通过联合开发、经营共有民族的文化产业资源，举办更多类似电影节、运动会、文艺汇演这样接地气、聚民心、受欢迎的群众性活动，拉近心灵距离、加深感情交流，进而涵养、形塑



两国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公众民意和舆情生态。^[17]此外，尼日利亚在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政治向心力，可以考虑两国共同创办以中等强国为主体的区域出版中心，面向国际和地区市场出版、销售中国主题图书的站点，将中国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旅游及生活的优秀作品，以更快速度、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介绍给尼日利亚及邻近国家的读者。

第二，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发挥尼日利亚的“二传手”和“中转轴”作用。“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在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下行压力冲击之下，通过发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各自优势，进行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潜在需求，以及培育经济增长机会和创新发展的国际合作模式。^[18]因此，“第三方市场”合作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相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自2015年1月，“第三方市场”合作启动以来，中国与有关国家积极开展合作，通过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取得各施所长、各得其所、多方共赢的良好成效，各方对此都生发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存在感。统计显示，中国已经同10多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国际组织正式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文件，基本建立起普遍参与、共同受益的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19]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方市场”合作概念的推出，既秉持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原则，也是充分释放“一带一路”各国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的载体平台，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由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大写意”，向深耕细作、精雕细琢的“工笔画”升级的主要路径和抓手，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20]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全国两会期间就表示，“未来中国将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两合作的同时，推进中国、投资所在国和发达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市场合作。”^[2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对外合作和国际交往不断深入，不再以产品质量和价格作为单一优势与外方竞争，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形态、社会分工和组织方式出现代际级差。尽管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尚且存在一定差距，但和除欧美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却享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相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实质上正在完成从追赶超越型向主导引领型的升级换代。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沿线相关国家中，绝大多数是人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沿线地区各国的现实国情和工业条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对我们来说落后的东西，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仍属“高大上”不够“接地气”的高端产品。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保证相关沿线国家在产能合作方面，有效承接中国优势产能，不仅是要“吃得下”、还要能“消化吸收好”，这确实是需要验证和慎思的问题。尽管尼日利亚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尖端科技，但毫无疑问在非洲国家里经济竞争力排名靠前，处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产业结构梯级的“代差”之间，这就给中尼两国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运作空间。^[22]中国与尼日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形成的这种错位竞争、补位合作关系，有利于合作各方充分发挥各自在大宗商品供给、人力和劳工资源成本、消费需求等不同领域的相对优势，既可以推动两国合作出现 $1+1>2$ 的“物理变化”，更能够产生 $1+1=X$ 的“化学反应”。

四、总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真诚伙伴和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在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方面，团结、依靠、支持发展中国家仍是中国推动大国特色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美国先是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威胁，后有拜登政府视中国为挑战，极力打压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势头和活动空间，将世界逐步推向中美各居一方、涉及领域广泛、交往相对受限的平行体系。随着来自国际社会和外部世界的压力有所升级，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中的基石作用更加明显。尼日利亚是非洲和发展中世界的大国，是我国在非洲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对我国开展非洲外交和夯实发展中国家基础依托具有独特价值，值得我国投入较多精力和资源来巩固这一战略支点。当前，尼日利亚发展前景既迎来良好机遇，又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只要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总体上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中国应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对接中尼各自发展战略和重点合作领域，探索对现有合作存量的潜力挖掘和二次开发，不断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努力为尼日利亚破解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贡献智慧和力量，并将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推广扩散到更多非洲国家。

责任编辑：肖成红



参考文献:

- [1] 丁 工. 我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与演变 [J]. 中国国情国力, 2016 (11): 31-33.
- [2] 鲁世巍.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 (03): 20-32.
- [3] 习近平.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11-30.
- [4] 姚 遥.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J]. 中国非洲学刊, 2021 (01): 3-23.
- [5] 丁 工. 中等强国合作体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J].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3 (02): 96-106.
-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R]. 国务院, 2015-03.
- [7] 邓文科. 1999年以来的尼日利亚“非洲中心” [D]. 外交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8] 博拉吉·阿金耶米 (尼日利亚). 大国意识与“尼日利亚治下的和平”的缘起 [J]. 西亚非洲, 2007 (05): 53-56.
- [9] 李文刚. 中国—尼日利亚共建“一带一路”: 优势、挑战及前景 [J]. 当代世界, 2020 (06): 74-79.
- [10] 丁 工. 以中等强国为支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迫切性与可行性 [J]. 欧亚经济, 2023 (05): 90-106+126.
- [11] 朴英姬.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困境及其治理 [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22 (03): 109-130.
- [12] 丁 工. 尼日利亚的发展与复兴 [J].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18 (04): 38-40.
- [13] 吴传华. 中国企业投资尼日利亚: 机遇、风险及应对建议 [J]. 亚非纵横, 2011 (05): 48-62.
- [14] 聂文娟. 尼日利亚“美强中弱”的外交格局 [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17 (02): 30-34+60.
- [15] 姚桂梅.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应对 [J]. 中国非洲学刊, 2020 (02): 85-99.
- [16] 丁 工. “一带一路”推动中缅“胞波”持续升温 [J]. 经济导刊, 2020 (02-03): 24-26.
- [17] 黄长彬. “一带一路”视域下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策略研究 [J]. 国际传播, 2020 (06): 73-83.
- [18] 李克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 [EB/OL]. 新华网, 2015-07-01,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01/c_1115787201.htm.
- [1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 [EB/OL].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2019-09-04,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wzs/sjtd/201909/t20190904_1037022.html.
- [20] 门洪华, 俞钦文. 第三方市场合作: 理论建构、历史演进与中国路径 [J]. 当代亚太, 2020 (06): 4-40+153-154.
- [21] 宁吉喆谈“一带一路”建设: 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EB/OL]. 中国新闻网, 2019-03-06,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3-06/8772857.shtml>.
- [22] 王永中, 万 军.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与中尼经贸合作 [J].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20 (01): 26-30.

**Successful Experience, Substance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Taking Nigeria as an Example**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have entered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a new platform and took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Nigeria is the largest economy and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Africa, and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frica. The successful cooperative experience, substance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between China and Nigeri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t present, Nigeri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not only have good opportunities, but also face some major challenges. Generally speaking, Opportunities outweighs challenges as long as we can draw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make us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taking the high–end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value chain as the main direction, actively synergize the respe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cooperation of some key fields between China and Nigeria, explore the potential tapp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stock, constant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rive to contribut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Nigeria in solving many difficultie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spread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is process to more African countries, make great effort to achieve the continuous in–depth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y pla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for the highest ideal and the ultimate goal.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Strategic rise;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merging countries